

□ 游宪生

经济增长四层次要素分析法

对经济增长要素的探讨,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从其发展历史来看,目前已主要经历了三要素论、技术进步决定论和总和生产要素分析法这三个阶段。随着当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笔者认为,还应加入有关经济体制和文化背景等要素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讨论,形成四层次要素分析法。

一、经济增长要素的历史考察

(一)经济增长的三要素论

早期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三个要素展开的。其中最早在研究中明确涉及到这些要素的应属英国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先驱者威廉·配第,他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劳动和土地这两个要素,即他所说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1〕}

随后的经济学家大师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在其著作中则强调资本和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尤其强调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较为明确提出三要素理论的则是法国经济学家萨伊,认为物品的效用是由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土地)共同创造的,因而价值也是由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个方面共同作用和协力的结果,它们就是生产的三要素。劳动创造了工资,资本创造了利息,土地(自然力)创造了地租。

上述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可以归结为三点。首先,他们提供了一系列他们认为决定产出增长的关键要素。这些要素主要包括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这三个基本要素;其次,他们提出一些关于这些变量相互关系的主张。一个众所周知的命题是,资本和劳动与有限的自然资源相结合所造成的报酬递减效应;第三,他们提议不同的要素在促进增长方面不同的重要性,及需要集中研究的关键要素。在所有这些要素中,资本积累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动态要素。

(二)技术进步决定论

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较早地提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在《资本论》中论述了生产量扩大可以不依赖于资本量增加的情况。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在这里一般是指劳动过程中这样一种变化,这种变化能缩短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须的劳动时间,从而使较小的劳动量获得生产较大量使用价值的价值”。^{〔2〕}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简单地说就是依靠科技进步。

明确将技术进步因素单独列项,作为经济增长因素中最有意义、贡献最大的一个因素独立出来的经济学派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其代表人物罗伯特·索洛发现仅仅用资本和劳动投入还

不能解释经济增长的全部内容,大部分的产业增长并不是由这两种因素投入带来的,而是由一个外生的、用以解释技术进步的“残值”(residual)决定的。他突破了经济增长理论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第一次提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具有最重要的贡献”的观点,不过索洛所称的技术进步因素是外生的,于是才有了以后的将技术因素内生化的努力。

新剑桥学派则强调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以及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三大因素。技术进步不仅会改变劳动生产率,而且会改变资本产出率,并形成一個独立变量。

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要素理论的核心主要是围绕在前一阶段三大基本要素的基础上引入了技术进步这一要素,并突出强调了这一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这种区分办法及其在方法论上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三)总和和生产要素分析法

战后,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要素研究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其中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对增长因素的分析,占有重要的地位。

丹尼森从三要素论出发,将其认为对长期增长发生作用并且能够影响增长率变动的主要因素分为七项。其中前三项是生产要素投入量,即劳动、资本与土地的投入量,后四项属于全部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受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的生产率或称“总和要素生产率”这两大因素的影响。

丹尼森所称的总和要素生产率概念同时考虑了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和其他投入对产出的影响,是衡量生产效率的较为全面的尺度。因此,当代大多数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增长的源泉时都沿用丹尼森的方法,先把经济增长的源泉分解为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和总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然后再对生产要素投入的各个构成部分以及导致总和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各个因素的贡献作具体分析。

目前,我国在经济增长要素研究领域方面,也大量采用了总和要素分析法。

纵观整个经济增长要素理论的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的过程也就是各种生产要素结合起来不断地进行社会扩大再生产的过程。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很多,如果将这些要素一一罗列出来,几乎要涉及到经济学的全部问题。一般说来,经济学家只择取其中最为重要的几个要素来作为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绝大多数经济增长理论的区别,正是在于它们对各种要素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各种要素间的相互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因而才形成了上述的从三要素论到技术进步决定论直至总和和生产要素分析法这一经济增长要素理论的发展主线。

二、四层次要素分析法

在充分肯定劳动、资本、资源、技术进步等四大要素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基础上,我们还必须要注意到经济体制和文化背景这两个重要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为经济体制能对经济增长起到关键的作用,而文化背景则可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调控作用。本文将把这六个要素分为四个层次将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一)第一层次:劳动、资本、资源——基本要素

1. 劳动与经济增长

劳动与产出和增长的关系,是一个经济学上较早被人们探讨的课题,在这里笔者就劳动投入和劳动力供给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

(1)关于劳动投入的指标

劳动投入量包括就业人数、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劳动质量(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在市场经济国家,劳动的质量、时间和强度一般是与收入水平相联系的。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劳动报酬能够比较合理地反映劳动投入量的变化。在中国,由于收入分配体制不合理等因素的影响,劳动收入还不能恰当反映劳动量(尤其劳动质量)的变化;而且,这方面缺少很多重要的统计资料,用价格指数来对收入水平加以调整也存在不少问题,所以用劳动收入量的变化来表示劳动投入量的变化在准确度和可信度方面都没有保证。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多数有关的研究文献都以劳动者人数来代表劳动投入量。从一段较长的时间看,劳动质量是有所提高的,但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则是有所降低的,二者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相互抵消的作用。因此舍掉这几个因素来计算劳动投入量的变化,误差不会太大。

(2)劳动力供给与经济成长的定量研究

设劳动力的增长率为 n , 即有: $N_t = (1+n)N_{t-1}$ (1)

其中, N_t 表示 t 年劳动力的供给。

在固定的劳动力—产出比 I 下, 产出与所需劳动力之间要满足:

$$N_t = IY_t. \quad (2)$$

其中, I 表示单位劳动产出, Y_t 表示 t 年的总产出。

此式即厂商之总体对劳动力的需求函数, 而式(1)为社会的劳动力供给函数。劳动力市场的平衡意味着劳动力的供给等于需求, 故有:

$$Y_t = 1/I(1+n)N_{t-1} = (1+n)Y_{t-1} \quad (3)$$

说明产出与劳动力以同样的增长率增长。劳动力市场平衡时的产出增长率等于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 n , 故称此增长率为自然增长率, 并可用 g_n 表示。

2. 资本与经济增长

(1)关于资本的源泉

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投资, 而投资来源于储蓄(即积累), 只有当投资率与积累率均衡时, 经济增长才是有保证的。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集中体制中, 政府动员资金的能力很强, 因此, 政府储蓄(积累)占的比重大。现在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企业支配的财力扩大, 职工收入也大为增加, 政府动员资金的能力则大为降低。这时, 资本积累特别要重视企业积累和居民储蓄。

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是企业利润。资本积累的另一条途径是劳动积累, 这对资金缺乏但劳动力丰裕的国家来说更有现实性。

与企业利润积累相比, 居民储蓄在资金积累中的比重要退居二位。但居民储蓄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国家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引导自愿储蓄。

银行信贷的增加也是资金积累的一条途径。与前几条途径相比, 银行信贷并不是真实的积累。在储蓄和投资存在缺口时, 银行信贷只是暂时填补储蓄不足的缺口, 但缺口还存在, 只有当银行信贷的增加促使利润增加, 从而促使储蓄增加时, 缺口才会真正弥补。因此对利用银行信贷创造资金的积累方式要谨慎管理。

(2)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

为了使分析简化, 假定: ①商品市场上, 在某一固定价格水平下, 厂商之总体的供给曲线为完全弹性; ②不考虑货币市场; ③在某一实际工资率下, 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曲线 S_N 为完全弹

性;④资本报酬率 $\partial Y/\partial K$ 为常值,不随资本存量的增加而下降。

商品市场的平衡意味着计划储蓄等于计划投资。设储蓄与消费保持固定的比重,即 $C=cY$, $S=Y-C=(1-c)Y=sY$, 考虑到时间的延迟,则有如下的平衡方程:

$$I_t = sY_{t-1} = (1-c)Y_{t-1} \quad (4)$$

其中, I_t 表示资本存量的增长,而每期之资本存量由同样的产出水平确定。即有:

$$I_t = K_t - K_{t-1} = v(Y_t - Y_{t-1}) \quad (5)$$

其中, K_t 表示 t 年的资本总量, v 表示 t 年资本存量增长率。

代入式(4)则得:

$$v(Y_t - Y_{t-1}) = sY_{t-1} \quad (6)$$

由此可解得,

$$Y_t = (1 + s/v)Y_{t-1} \quad (7)$$

由此看出,平衡产出的增长率为 s/v 或 $(1-c)/v$ 。边际储蓄倾向 s 越大,资本—产出比 v 越低,增长率越高(或边际消费倾向 c 越小,增长率越高)。因此, s 越大意味着储蓄越大,因而意味着投资越大,资本存量越大,产出增长越快。资本积累率的高低决定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可见,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具有某种决定性的作用。

3. 资源与经济增长

在西方经济学中,最早意识到资源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是马尔萨斯,他首先提出了由于人口增加导致土地资源供给不足的可能性。但是,最早较为系统地研究资源经济问题的西方经济学家要数本世纪 20 年代末的伊利和莫尔豪斯,他俩于 1929 年共同出版了《土地经济学原理》一书,标志着西方资源经济学的开始。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由于资源问题的提出,西方学者对资源经济学的研究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60 年代后期,以探讨人口、资源、环境为主要内容,以讨论人类未来命运为中心议题的“罗马俱乐部”成立,并发表了轰动整个西方世界的第一个报告——《增长的极限》。

自然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自然资源的质量这两大方面的因素。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状况对于该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配进或制约作用。

在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中,资源质量比资源数量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二)第二层次:技术进步——核心要素

技术进步是使经济获得持续增长的内在活力。

定量估算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模型有两大类:一类是生产函数,如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线性生产函数、固定替代弹性生产函数等;另一类是增长速度方程。当我们的目标是分析投入量与产出量间的关系或计算技术水平时,可采用生产函数;若除此之外,还希望分离出技术进步对产值增长速度的贡献时,应采用增长速度方程。

1. 生产函数

劳动生产率是生产函数的一种特例,这是客观事实。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例,它把劳动 L 和资金 K 作为生产要素的两种投入,与产出 Y 之间存在下述函数关系:

$$Y = AK^\alpha L^\beta \quad (8)$$

式中, Y ——产出量, α 、 β ——分别为资金、劳动的产出弹性, A ——技术水平, K ——资本投入量, L ——劳动投入量。

当假设劳动的产出弹性为 1,资本的产出弹性为 0 时,则(8)式变为:

$$Y=AL \quad (9)$$

$$\text{此时技术水平 } \Lambda=Y/L \quad (10)$$

如果我们用劳动者人数表示劳动的数量时, Λ 刚好表示平均每一个劳动者的产出量。换句话说, 这时衡量技术水平的指标就是劳动生产率。

假设资本的产出弹性 α 是 1, 劳动的产出弹性为 0 时, (8) 式则变为:

$$Y=AK \quad (11)$$

$$\text{此时的技术水平 } \Lambda=Y/K \quad (12)$$

这时, 衡量技术水平的指标就是资本产出率。

可见, 劳动生产率、资本产出率都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技术水平的特殊情况。一般说来, 技术水平 Λ 的形式为:

$$\Lambda=Y/(K^\alpha L^{1-\alpha}) \quad (13)$$

它不仅与产值有关, 还与劳动有关, 也与资本有关, 因此它是产出与投入加权的比值。(13) 式计算出的技术水平更具综合性, 比 (10) 式或 (12) 式的技术水平更合理些, 劳动生产率或资本产出率只能单独考虑产值与劳动之比或产值与资本之比, 而不能综合考虑劳动与资本同时变化的情况。

最初, 柯布和道格拉斯认为在生产函数中的 Λ 是常数, 实际上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描述的是某一时刻产出量与投入量间的关系, 因此, 在 α 已知的情况下, 可以计算出某一时刻的技术水平 Λ :

$$\Lambda=Y/K^\alpha L^{1-\alpha} \quad (14)$$

1941 年, 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认为 Λ 是随时间 t 变化的, 且 Λ 与时间 t 呈下列关系:

$$\Lambda=\Lambda_0 e^{nt} \quad (15)$$

这是生产函数的一个进步, 表示技术水平随时间变化, 且呈幂函数形式增长。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为:

$$Y=AK^\alpha L^\beta \quad (16)$$

但此后生产函数研究一直没有大的进展, 其原因就在于当时未能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直接计算出技术进步作用。直到 1957 年, 美国经济学家索洛 (R. M. Solow) 在中性生产函数假设下推导出增长速度方程, 分离出了技术进步的作用, 揭示出经济增长过程的背后, 技术进步所起的重大作用, 把生产函数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

根据目前的研究结果, 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计算出某一时刻的技术水平, 并由此计算技术进步对新增产值的贡献, 或技术进步对新增劳动生产率的贡献, 但不能直接计算出技术进步对产值增长速度的作用和贡献。

事实上,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是简单地由于劳动者产出的增加。如果劳动者人数未变, 引入新的设备或工艺, 即增加资金的投入的话, 同样会使产出增加, 这时劳动生产率虽然提高, 但综合考虑资金也增加的情况, 用 (13) 式计算出的技术水平却未必提高。

使用资金产出率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例如, 某企业技术水平不变, 资金数量也不变, 由一班生产改为两班生产, 劳动者人数相应增了 1 倍, 资金产出率提高是在增加 1 倍劳动者人数的基础上得到的, 但资金产出率指标不能反映劳动者人数变化的作用, 它所表现出的效益提高程度是片面的, 而用生产函数综合考虑劳动和资金的作用, 所得结果才更符合实际情况。

因此, 笔者认为: 使用仅考虑单项投入与产出关系的指标来衡量效益, 有很大的片面性。采

用综合考虑多种要素投入与产出关系的技术水平(生产函数)衡量经济效益更合理,它比劳动生产率或资金产出率更能全面地说明问题。但无论如何,劳动生产率、资金产出率只是生产函数的特例。

2. 增长速度方程

上述生产函数都是研究产出与投入之间的绝对量间的关系。增长速度方程分析的是产出增长速度、投入增长速度与技术进步速度间的关系。

从产出增长型技术进步生产函数的一般形式出发,求全导数并整理后,可以得到:

$$\frac{dY}{dt} = \frac{dA}{dt} + \alpha \frac{dK}{dt} + \beta \frac{dL}{dt} \quad (17)$$

它的左端为产出增长速度,右端第一项是技术进步速度,第二、三项分别为参数与资金、劳动增长速度的乘积,参数 α 为资金的产出弹性, β 为劳动的产出弹性。

由于实际数据都是离散的,在所取时间间隔 Δt 较小的情况下,可用差分方程近似地代替微分方程(17)式

$$\frac{\Delta Y}{Y} = \frac{\Delta A}{A} + \alpha \frac{\Delta K}{K} + \beta \frac{\Delta L}{L} \quad (18)$$

取

$$y = \frac{\Delta Y}{Y} \quad a = \frac{\Delta A}{A} \quad k = \frac{\Delta K}{K} \quad l = \frac{\Delta L}{L}$$

(18)式可写成: $y = a + \alpha k + \beta l$ (19)

式中, y ——产出增长速度, k ——资金增长速度, l ——劳动者人数增长速度, a ——技术进步速度。

(三)第三层次:经济体制——关键要素

现代经济增长作为一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过程,是在体现一种基本经济制度的具体经济体制下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循环往复地扩大进行,从而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表现为社会经济增强的实质和内容;经济主体彼此之间及其与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他们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一定的利益结构关系,以及激励和影响他们进行社会生产的社会动力结构系统,表现为社会经济增强的社会经济形式。二者作为社会经济增强过程的统一体,互相作用,互不分离。任何社会经济增强过程,都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社会经济体制的作用才能实现。因此,研究社会经济增强过程,必须注意研究社会经济体制与这一过程的关系及其对这一过程所起的关键作用,研究社会经济体制的实现与经济主体的实践之间的关系。

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体现为:

1. 经济增长状况制约经济体制

本世纪50年代,我国正处于刚刚解放不久的恢复时期,由于国民党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加上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经济封锁与政治冷战,当时生产资源相当紧张,这时我们必须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国防力量,所以以高度集中决策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唯一的选择。另外,一个促使实行集中决策的原因是,这时国家还未形成完善的市场体系,亦即生产要素市场还未形成或不够成熟,如果实行市场经济,则这种经济将只能导致需求的膨胀,而不会导致供给的增加。在缺乏有效的市场机制和企业机制情况下,过早地放开价格,将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2. 经济体制对经济增长起着关键作用

综合地说,经济体制主要影响到如下几个方面:

(1)经济增长的数量,它表现为经济增长率等指标。

(2)经济增长的质量,它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质量、生产力要素协调作用的质量和生产力成果的质量等方面。生产力质量的提高意味着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包括产业的高度化、出口商品档次的提高等)和商品的充足丰裕程度,而计划经济国家在这些方面往往做得比较不够。

(3)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即经济增长是否具有强烈的周期性,而且周期的波长是否难以捉摸。从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来看,前苏联、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经济波动就非常明显,它表明行政干预和强制命令使得经济活动常出现大起大落,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实现风险分流,因为第三产业的发展、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失业和市场不景气的状况。

(四)第四层次:文化背景——调控要素

社会意识形态作为文件背景的最重要方面具有多重定义,归纳起来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将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认知体系,是某一团体对世界的认识;第二,认为意识形态与个人、集体的行为有着密切联系,是行动的思想前提,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个人和集体的行为。但是,早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出现之前,意识形态就被政治化了。

意识形态政治化固然显示了意识形态强劲的政治功能,即维护政权的合法化,推动大规模社会政治动员,实现政权的转移,但是极端的政治化也有其致命的弱点:(1)意识形态的政治化使意识形态的其他功能削弱;(2)意识形态的全面控制,造成了全体社会公众思想的模式化,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发挥;(3)意识形态的斗争长期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逐渐形成一种封闭的体系,与社会存在的距离越来越大,不能很好地进行自我的更新创造,甚至沦为少数个人或集团的工具;(4)除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不同阶层有着各自独特的思想与信仰)的发展受到压制,形成全社会意识形态的中心——边缘结构;(5)造成人们对意识形态的反感与厌恶,旧的政治社会化渠道和方式难以完成其功能,结果是社会公众认识的混乱与信仰体系的涣散。

总之,意识形态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本文这里并不强调它在阶级斗争中的功能(毫无疑问,这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侧重把它看作是一定团体中所有成员共同具有的认识、思想、信仰、价值等,是这个团体中每个成员对周围世界以及团体本身的认知体系,反映了该团体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为团体的集体行为提供了合理性辩护,同时也对个人行为提供约束。可以说,意识形态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中的任何团体,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都有自己一套意识形态。本文将意识形态作一简要分类:(1)根据团体范围,意识形态分为包涵型和排斥型两种,前者指团体是开放性的,并没有太多的严格限制;后者相反。(2)根据意识形态与政权关系,可以分为官方的和民间的两种。在任何国家中,作为政权合法化论据的官方意识形态只有一种。而民间的意识形态则可以分为普遍的和特殊的两类,前者是全体社会公众共同具有的,后者是具体团体特有的。本文这里主要讨论的是作为与政权紧密联系的官方意识形态,但这种意识形态又深受民间的与政权相联系的意识形态和其他团体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并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得到变革。

意识形态对经济具有基本的规范功能不是最终决定性的,只是一种观念力量发挥着对物质力量的反作用。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在其《国家兴衰探源》(1993)一书中对意识

态的规范团体间关系的功能作了详细论述。他认为国家兴衰与社会中利益集团的存在有着直接的关系。利益集团的结构、集团之间的关系决定着经济的增长或停滞。而不同的意识形态则是决定利益集团结构与关系的一股重要力量。奥尔森认为,一般讲,利益集团越弱,经济越能发展。他认为法国二战后经济发展一定程度上归因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削弱了特定利益集团的发展。印度围绕种族制度建立的意识形态隔绝了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融合与合作,从而阻碍了印度经济的发展。

对于意识形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学者们早就有所论述。马克思提出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就指出了意识形态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它可以一定程度上推动经济增长,也可以阻碍经济增长。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983)在他那本内容庞杂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提出,在社会发展中,存在着两组力量:物质力量——精神力量;社会力量——个人力量。两组力量之间互为因果,互相起着作用与反作用。结果是一组力量的增长促使另一组力量跟着增长;一组力量削弱时,另一组也难以幸免。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87)中对基督在西方经济发展过程中作用的强调以及儒教对东方经济阻碍的论述,实际上也是对意识形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一种肯定。以诺斯为代表的新经济史学派试图将意识形态纳入制度变迁的模型中。诺斯认为,一套能够促进制度变迁成功、经济持续增长的意识形态,必须能够提供一个全面的世界观点,必须在解释外部条件的可观察到的转变时足够灵活。对他来说,全面性和灵活性是意识形态对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推动的前提条件。

总之,以上四个层次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紧密相连、逐层递进的,它们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四层次要素分析法的研究理论。

注:

(1)配第:《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货币略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1页。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350页。

主要参考书目:

1. Ghatak, S. (1986). An Introduction to Development Economics. Allen & Unwin, Second Ed.
2. Herrick, B. & Kindleberger, C. P. (1983). Economic Development. McGraw-Hill Co., Fourth Ed.
3. Solow, R. W.: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Review of Economic and Statistics, 1957.
4. Jones, H. .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Theories of Economic Growth. Nelson, 1975.
5. 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6. [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上、下)》,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3月版。
7. [波]米哈尔·卡莱斯基著:《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导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 [美]西蒙·库兹涅茨编著:《现代经济增长》,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9. 索洛编著:《经济增长论文集》,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10. [日]朴圣相:《增长和发展》,三联书店,1991年版。
11. 何樟勇:《80年代以来国外经济增长理论的新进展》,《浙江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作者系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单位邮编为200433)